

开发民智：近代知识分子主动担起历史责任

——近代无锡社会教育与地方自治的关系

蒋伟新

[摘要]近代无锡地区的教育革新走在全国前列，社会教育事业更是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而广泛活跃地开展。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地方自治首先要开发民智，主动承担起教育救国，提高民众国民意识的历史责任。在民众教育、地方自治的实验中，做出了出色成绩。总结其教育思想和实践，以及文化教育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对地方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以及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关键词]开发民智 地方自治 社会教育 民众教育实验

近代中国，在社会剧烈变动的过程中，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始终在思考探索、关注总结鸦片战争以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社会变革没有取得成功的症结。看到普通民众对多次政治变动总是漠然相对，难以引起群众的普遍热情和广泛支持，很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的怨愤和遗憾。为此对民众的认识和态度分为两派，一种是不相信民众的觉悟和力量，幻想依靠少数社会精英来救国；另一种是从教育入手以图提高国民素质，唤起民众参与民主，达到政治改革的目的。戊戌维新以后，这部分知识分子在提出“实业救国、振兴工商”的同时，提出“教育救国、开发民智”的口号。他们自觉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化教育改革的事业之中，推动通俗教育、白话文运动和新式学校教学，普及大众文化。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一系列社会教育运动深入开展，民众的文化教育基础和参与政治的自觉性有了一定提高，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五四运动以致大革命的兴起，做了基本的民众思想启蒙和准备工作。总结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联系当时的社会

改革热点地方自治问题，考察两者的关系，对当今的地方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方自治首要开发民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种社会制度的生存，不仅需要生产力作为基础，需要政治结构作为组织，还需要思想文化作为支撑。纵观历史发展，思想文化的变革总是作为政治制度变革的前导和推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思想和主流文化的长期道德教化，一方面规范了民众的思想行为，另一方面也造成民族的奴性和懦性思维，缺乏自主和平等思想意识。主流传统文化思想体系在起到巩固和维系封建社会稳定和延续的同时，另一方面的作用也逐渐显露，使得中国社会发展前进缓慢甚至迟滞衰落。在西方文化强势侵蚀之下，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它的不合时宜。

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不甘心中华民族面临落后危亡状况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开始了艰苦的文化探索。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改良派，从西方引进一些新的政治制度理论，开始了“变法”实践，并推动了清政府的“新政”，试图采用立宪改革以及地方自治来救亡图存。

清朝末期，许多人都认识到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政治的腐败，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倡言民权，呼吁变法，他们在提出建立宪政政体方案的同时，把革新图治的希望寄托于地方政治改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股地方自治思潮，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从地方自治做起。“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基本”。^[1]维新派把地方自治同变法维新运动联系起来，提出要兴民权，必先兴绅权，而要兴绅权，最好的途径是实行地方自治。1898年，梁启超说：“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为主义”。立宪派把地方自治看作是推行宪政

的基础和根本，1901年，张謇在《变法平议》一书中，主张仿行日本地方自治制度，“设府县议会”，实行地方自治。20世纪初，以上海商务总会为主要代表的新兴工商业界也感到“清廷大势岌岌，不复可有为”，“非仿文明各国地方自治之制，不足以图强”。

这一时期地方自治舆论的中心内容，在于如何培养国民意识与实行宪政。各派政治力量对地方自治和开发民智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识到这两者的重要性，认为地方自治是培养国民意识、伸张民权、实行宪政的根本途径。分歧是：一派认为民众没有地方自治能力，先要依靠开明君主和开明绅士实行变革，推行地方自治，然后可以开民智、立宪政；反对者认为可以在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开发民智，然后实行自治、宪政。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改良派论争中国变革方式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中国民众有没有国民性，有没有共和国民的资格，能不能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改良派认定国人长期受封建正统文化思想束缚，只有臣民的奴性，只是一盘散沙，不能把治理国家的重任交给民众，否则定会引起天下大乱、国家分裂甚至灭亡；只能依靠开明君主实行“开明专制”，逐渐推行变革，才能免于内外交困下的国家民族灾难。梁启超提出：“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应当首在伸民权，重乡权，培养人民的政治能力。而伸民权、重乡权，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开绅智，二是定权限。他在《论湖南应办之事》文中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故“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以上三端，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窃以为

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有人撰文说：“自治之制，盖所以补官治之不足，而与官治相辅而行”，“绅士者，实地方自治之代表也”。^[2]因此改良派的“伸民权”，并不是要让普通民众掌握政权，而首先要兴绅权，“开绅智”，甚至要先“开官智”。因为“中国自开国以来，未尝有国民也”，中国民智未开，人民智力低下，缺乏自治能力，故而“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中国进步的方法，只能渐进，只能依靠开明绅士以地方自治辅助官治，实行君主立宪。由此他们的着眼点在于绅民，他们的伸民权是要让绅士作为地方自治的主导，掌地方自治的权限。

革命派则认为当前中国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封建统治集团已经腐烂透顶，必须先要采用暴力革命推翻皇权，然后中国可以有民权，可以搞民主共和。当然民众先得训练，经过“军政”、“训政”阶段，然后再进入“宪政”，实现国家的民主政治。这里同样有个去除民族劣根性，唤起民众普遍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成为真正的国民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个普及国民教育的过程，使民众达到一定文明素质程度，提高国民之参政意识，培养立宪国民之资格，使“举国之人皆有‘我即国，国即我’之理想”。

地方自治是孙中山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综合了中国传统儒家民权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提出自己的以直接民权为核心的地方自治理论。地方自治以县为基本单位，直接民权包括人民对于本县的政治，拥有普遍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人民掌握了这四大民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权”以后，用来管理政府行使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这五项“治权”，才算是一个权能分治的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推之一省、一国，才能实现国家治理，奠定国家的基础，建立真正的民国。所以孙中山的目标是人民真正的自治，做到主权在民，民众要成立自己的议会和选举自己的领导者，有充分的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意愿的权

利，同时也有相应的法律来保障他们的利益和权力不受国家的干涉，最终“唤起民众，发动民力，加强地方自治组织，促进地方自治事业，以奠定革命建国的基础”。

但是孙中山又担心国人素质过于低下，不堪负于民权重任，所以要由“先知先觉者”去教育发动“后知后觉者”以及“不知不觉者”。孙中山在 1906 年主持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将革命建国程序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期。其中第二期约法之治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3]因为“我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之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定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4]211} 训政时期是军法之治向宪法之治过渡的时期，在此时期，由国民党代表人民治理国家，同时“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4]208} 为宪政时期实现民主政治做准备。

国民党执政以后，打着“总理遗教”的旗号，竭力推行地方自治。根据孙中山的建国理论，认为强国政府，必建筑于健全的民众之上，然而如何能使民众健全，则必定要先实行地方自治。一般民众缺乏自治知识、自治能力、自治精神，并不知道主权在民的意义，并不懂得主权在民的方法。要做到主权在民，就要做切实的训练工作，使民众知道自己对国家的关系，对社会的责任，懂得民权的意义，明了民权的运用。地方自治就是训练民众参政的能力，就是直接民权的准备，为实施宪政创造条件。按照孙中山《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内所举的清户口、立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等地方自治六纲领，当时各级地方政府与社会各界相配合，在地方自治各个方面做了相应的工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进步知识分子通过自身的努力，主动担负起开发民智的历史责任。

二、无锡兴起社会教育热潮

戊戌维新前后，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教育救国”的口号下，主张效法世界先进国家，兴办学校，开办报馆，提倡启发民智，培植人才，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近代无锡教育革新兴起较早，新式学校教育发展领全国风气之先。1898年2月，杨模等人就创办了谡实学堂，同年8月，俞复等人开办三等学堂。1904年10月无锡成立锡金学务公所（又称学务处），这是全国最早设立的民间新式学校教育管理机构，比朝廷设学部掌管全国学务还早一年。到1905年无锡城乡已有各种新式学校包括女子学校40多所。^[5]

在普通学校教育兴起的的同时，社会民众教育也受到关注。维新以后先后兴起的通俗教育、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等社会教育活动都曾在无锡推行试验，无锡的社会各界人士也曾对这些教育潮流作出积极反应。1898年3月裘廷梁等人创办《无锡白话报》，拉开了无锡社会通俗教育的序幕。无锡的职业教育举办也比较早，20世纪初，无锡城乡就出现了兴办职业教育的浪潮。到1909年清政府颁布办理半日半夜学堂的诏谕以前，无锡已经办有多种通俗职业学堂。侯鸿鉴、顾倬等人于1905年创办“商余补习夜校”，招收商店青年学徒业余补习文化，每日晚间授课。并经常举办演讲会，邀约本地有名望之士义务演讲，每次听众达到100多人。同年周舜卿创办“商业半日学校”，后改名为“廷弼商业学校”。华子唯、华倩朔在荡口创办“鹅湖女学”，校内设刺绣专科，这是无锡女子职业教育的开始。1907年华文川、李佩馥夫妇设立“锡山绣工传习会”，许多女校也都附设刺绣科或将刺绣作为一门选修课程。1907年，南门外伯渎港办有商余夜校，此外还有城中第一、第二半日学校、天下市的蓉阳半日学校、青城市的半日女学等，1911年，怀上市严义庄的“严氏经正学校”也开办了农工商余夜校。

到辛亥革命前，无锡城乡有公私立学校 152 所，其中包括职业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 10 多所。^[6]

民国初期，蔡元培任教育部长，设立“社会教育司”，发布了关于通俗教育讲习所、图书馆等规程，全国各地开设“通俗教育研究会”。无锡进行的通俗教育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组织通俗教育宣讲所，定期定点到城乡各处宣讲；二是创办图书馆，到 1919 年，除县立图书馆外，还在农村建立了开原乡大公图书馆、天上市村前图书馆、万安市教育会图书馆、青城市新民图书馆等。1917 年设立了县立通俗教育馆，分为博物和演讲两个部。博物部陈列了各种物品 2694 件，供民众参观。演讲部采取定期、临时两种方式举办演讲会，由侯鸿鉴等人训练演讲员，然后到各地演讲，以宣传科学、卫生及改良风俗为主要内容。当时全县 17 个市乡还设立 100 多所公众阅报所，公园、体育场等一些公众文化体育场所也先后建立，成为通俗教育中举办的内容。^{[7]³⁴}

民国成立后，新的教育体制形成，各类职业教育公私并举进一步发展，开始遍及城乡。当时有“县立乙种工业学校”、“市立女子职业学校”、“市立泾皋女子职业学校”、“私立乙种商业学校”、“无锡实业学校”等校先后设立。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无锡共有全日制和业余的工商职业学校 20 多所。^[8]早先的一些职业教育，以文化常识、商品知识、珠算簿记、手工工艺和日常副业等为主，受文化基础及师资设备等条件因素限制，学校教育中工程技术类科技知识还很少涉及。1918 年以后，随着无锡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工商各界纷纷举办专为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的职业学校。如荣德生办的“公益工商中学”，杨翰西办的“广勤金工学校”，米豆业办的“积余商业学校”，“锡钟社”冯晓钟等人办的“锡钟高级商业学校”，钱殷之等人办的“纲南高级会计科职业学校”等。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无锡的各种社团组织、学校、慈善机构和热心教育的人士，在全国平民教育的浪潮中，纷纷办起平民学校、义务夜校和工人夜校。平民教育的意义、目的和普通学校教育不同，举办平民学校完全是尽义务，经费一般由热心人士私人资助，教育对象是失学青年和成人平民，基本免收费用，通常都在夜间上课，以识字、生计、公民常识 3 方面为主要教育内容，4 个月一期。1924 年间成立的“锡社”，把举办平民学校作为主要活动任务之一，到 1926 年就已经在城乡各地办起了 12 所平民学校，各校借用当地小学教室作校舍，教员由锡社社员或社外热心人士义务担任，开设读法、常识、珠算等课程，学生总数达到 542 人。^{[7]36} 其他社团和学校举办的义务学校、工人夜校和农村平民夜校也遍布城乡各处。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30 年代，民众教育成为一项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教育运动。在一批教育界人士的热心推行下，民众教育较平民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又有发展，教育内容也更为丰富，可分为健康、公民、生计、文字、家事、休闲 6 项。教育形式分为民众学校教育和民众社会教育两种：民众学校教育以教学文化知识的课堂教育为主，对象是 12 岁以上、50 岁以下以工厂和商店职工为主的社会贫困失学民众，课程有识字、计算、珠算、常识、唱歌等，夜间上课，修业期限为 3—4 个月；民众社会教育则借助运用公共文化设施，如教育馆、图书馆、陈列馆等，还组织一些社会性的文化活动，如剧社演出、集会演讲等，包括了生计、健康、公民、休闲等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内容。这段时间里，城乡民众学校、劳工学校、工人夜校纷纷设立，平民学校也都改称为民众学校。在开展民众学校教育的同时，民众社会教育也迅速展开，原来的通俗教育馆改为民众教育馆，还新办了农民教育馆、工人教育馆、民众茶园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教育机构，积极活跃开展各种民众教育活动。

1928年7月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院迁来无锡，1930年6月改名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办学宗旨为培养民众教育人才，研究实验民众教育事业。省立教育学院的师生在俞庆棠、高阳的带领下，积极开展民众教育，先后设立了各种民众教育实验区、实验民众教育馆和实验民众学校，使无锡的民众教育活动进一步推向高潮。无锡成为全国社会教育的“三大中心”之一。^[9]

社会教育运动的活跃开展，是爱国知识分子对于开发民智，唤起民众成为真正国民的时代要求作出的自觉反应，对于提高民众的文明素质具有一定作用，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地方自治运动的重要部分，无锡的社会教育实践，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当然这些毕竟只是基础工作，其所能取得的社会改良效果是有限的。事实上，宪政制度所要求的“民智”具有远为广泛的内容，要求民众对民主政治文化和价值的普遍知识及自觉。冀图用简单的普及社会教育，以此达到“造就健全的公民，改造整个的社会，并充实个人的生活”，“藉以亲近民众，唤起民众，启发其组织能力，引进科学知识及技术，于民智日开民生改善之中，社会组织日健，国势自必随之兴隆”^[10]的目的，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下，还只能是一种善良愿望。

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民众教育实验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进行的实验事业，不仅是民众教育活动，同时也直接进行了地方自治实验。教育学院先后筹设的实验基地有：黄巷乡民众教育实验区、农民教育馆、社桥村实验民众教育馆、丽新路工人教育实验区、江阴巷民众图书馆、实验民众学校、南门实验民众教育馆、高长岸农民教育馆、惠北民众教育实验区以及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等。^{[7]68}黄巷乡民众教育实验区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创办最早、使用力量再多的一个实验区，于1929年初开始筹备，同年3月开展工作，1932年夏季结束。实验区的工作目标，是计划用3年时间，以民众教育的力量推进一个乡的地方自

治，普及教育，同时产生适用的教材和教法，为准备下一步开辟以区或县为实验单位提供经验。丽新路工人教育实验区于 1930 年春创设，1934 年结束，实验目的是以工人为主要施教对象进行政治、文化教育。高长岸农民教育馆设立于 1930 年秋，1933 年夏结束，是以村为单位进行的民众教育实验。南门实验民众教育馆于 1930 年秋成立，是为实验城市民众教育实施方法，包括工人教育和棚户区贫民教育，办有民众茶园、民众保健处、阅书处、阅报处、民众娱乐处、民众法律顾问处、城南自治协进会、业余读书会等项目，直到 1937 年抗战爆发结束。惠北民众教育实验区开办于 1932 年秋，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筹设于 1932 年 8 月，都是在黄巷乡民众教育实验区以乡为单位实验结束后，以区为单位进行的农村社会实验，原定实验时间为 3 年，后延长至抗战爆发才结束。江阴巷民众图书馆设立于 1930 年春，1933 年 4 月结束，在划定服务区域以图书馆作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实验。实验民众学校于 1933 年创办，开设从文盲到初中等不同文化程度的班级，学生有工人、店员、小商贩、失学失业青年，还有家庭妇女及儿童，分日校、夜校轮流上课。^[11]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设立各个基地，特别是几个实验区的目的，除了民众文化教学以外，是要帮助当地进行地方自治。开展的主要项目有：^[12]

- 1、成立乡村改进会或自治协进会。“乡村自治的实现，必须使一盘散沙之农民，先有组织，俾民众在共同信约之下，得发挥其力量”。乡村改进会或自治协进会主要由当地热心公益事业青年农民组成，村成立村改进会，镇成立镇改进会。村镇改进会一般设干事 1 人，主持会务。如果某一村镇改进会会员较多，则可以设干事多人，其中 1 人为总干事，主持会务。干事由会员选举产生，任期 1 年，可连选连任。各村镇改进会按照会员人数比例推选代表组成实验区联合会，并分担职务，再推选会长 1 人，副会长 2 人，主

持联合会日常工作。村镇改进会每星期至少召开全体会员会议一次，主要内容是讨论本村镇有关乡村建设问题，并就此作出决议。“举凡修桥、造林、筑路、开办小学等地方公益事业，均由该会发动主办之”，作出的决议大多都得到了执行。

2、协助保甲编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把推行健全保甲制度作为地方自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江苏省政府要求各教育机构协助指导。教育学院各实验区在协助保甲编制的同时，还积极从事保甲制度的实验，内容主要是：①定期召开甲民会议和保甲会议，讨论本区域内应兴应革各类事项，并利用会议训练甲民关心时政；②取具联保切结与编订保甲规约，增进民众互助共信，提倡新风制约不良习气；③举办保甲长讲习会或训练班，并在自治实践中加以指导训练，由保甲长领导乡民在保甲内自治、自卫、经济、教育、卫生等诸项实际建设工作中获得知识，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3、成立完备信用合作组织。农民常年遭受高利贷盘剥，加重了生活的艰苦。实验区与江苏省农业银行无锡分行合作，开设了农民借款储蓄处和农村贷款处，并在实验区组织农民成立贷款联合会以及储蓄会，指导农民现代金融知识。以后又将借贷联合会改组成信用合作社，还在信用合作社附设合作仓库，举办农产品储押放贷业务。

4、推进各种合作化。推进合作是实验区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区都设有专职的指导员，负责指导本地区农民成立各种合作社，有信用兼营合作社、稻麦蚕生产供销合作社、蔬菜生产供销合作社、工艺品产销合作社、养鱼合作社、养猪合作社、垦殖合作社、运销合作社、水利合作社等等。在指导农民成立各种合作社的同时，也很重视对农民进行合作知识教育，举办合作讲习班或讲习会。并且重视合作社的管理，保证开办的合作社的质量，业务不良或运行不善的及时加以整顿或解散。

5、普及科技知识，推广指导先进农业生产。所做的主要工作是：①推广优良稻麦品种；②防止稻麦病虫害；③指导蔬菜栽培；④举行植树造林运动；⑤推广改良新式农具；⑥举办农产品展览会和评比活动。

6、指导农民开展副业生产。指导的副业生产有：①蚕桑，这是无锡农村最主要的副业，实验区与华新制丝养成所合作，设立育蚕指导所，大力推广改良蚕种，组织稚蚕共育和烘茧合作，并指导农民增加饲养秋蚕，增加农民收入；②养猪，是农民最普遍的家庭副业，实验区帮助农民借贷资金，改良猪种，防止猪病；③传习手工艺，指导手工艺品的加工和生产销售。

7、开展健康业余生活教育，改良传统旧习。休闲教育是民众教育实验的一项重要内容，教育学院《实验区设施纲要》规定，休闲教育的目标是：使农民有一种自娱娱人的才能，有参加各种娱乐活动的志愿与习惯，不作赌博等无谓之消遣，能作一种简易健身运动，有讲述故事谈话时事之能力与习惯，有欣赏音乐图书戏剧等艺术之能力，有静观事物以娱身心之习惯。为此实验区普遍开设民众茶园，开展文体娱乐、演讲报告、阅读书报、谈话讨论等活动，利用民众闲暇生活，寓教于乐，以求提高民众知识技能，改良风化习俗，促进社会文化，丰富民众生活。在此同时，提倡民众公共卫生，设立卫生所，建立保健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宣传破除迷信，改良婚丧旧习，指导民众健康生活。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遵循孙中山“必须唤起民众”的号召，团结了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发扬牺牲奉献精神，深入社会底层和农村民众，举办的民众教育研究实验事业，也是一次地方自治的积极实践。虽然由于社会和自身的局限以及理论的不足，实践中也有弱点，但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评价，其取得的成绩以及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一些经验至今还值得借鉴。

四、结语

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思想和实践，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有利于民主宪政的建立，也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人民的自治能力。近代知识分子进行的开发民智教育活动，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部分。两者之间互有联系、互相促进。分析总结这种内在关系，对我国当前现代化进程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地方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的教育制度现代化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事业具有积极意义。

注释：

- [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G].北京：中华书局，1979：722.
- [2]罗家伦.浙江潮（中华民国史料丛编）[G].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央文物供应社，第二期：3.
-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172.
-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5]陈钟英，周汉成.关于教育会的订正[J].无锡文史资料：第十六辑，1987：145.
- [6]方玉书，卢钟耀.解放前的无锡职业教育[J].无锡文史资料：第十四辑，1986：39.
- 另据：周汉成.解放前无锡教育行政机构的演变[J].无锡文史资料：第十九辑，1988：117“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全邑已创立公私各类新式学堂170多所”.
- [7]陈钟英.抗日战争前无锡的民众教育[G].无锡地方资料汇编：第三辑，1985.
- [8]王赓唐，汤可可.无锡近代经济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94.
- [9]朱邦华.无锡民国史话[M].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0：139.
- [10]梁漱溟.高践四先生事略[N].人报，1946-7-6.
- [11]唐孝纯.人民教育家俞庆棠[M].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45-57.
- [12]参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第六章“无锡实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